

《后典丽赋》的编选与传播考论

□许瑶丽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 610059]

[摘要] 南宋进士试赋制度较北宋更为长期稳固,与此相关的律赋集的编选在南宋也极为兴盛,然今天大多佚没无闻。《后典丽赋》是南宋律赋选集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乃婺学唐氏学派代表唐仲友所编选。该书选文详今而略古,体现出鲜明的趋时特征。此外,该书刊刻所涉及的贪墨行为,凸现了律赋集编选的牟利动机,因而在选文质量上难与北宋律赋集相比。在这样的律赋范本的指导下,宜乎南宋律赋日渐走向没落。

[关键词] 《后典丽赋》; 唐仲友; 律赋; 编选原则; 刊刻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0)06-0050-06

南宋由于进士科试诗赋的制度相当稳固,几乎没有被动摇过,所以举子研习律赋成为进学的必然之路,与之相配合的律赋集与赋学书籍编撰也是相当的兴旺。南时期出现的律赋集很多,有以单人作品为主而结集的《郑屯田赋集》,更主流的则是律赋总集,如《典丽赋》、《后典丽赋》、《指南赋笺》、《大全赋会》、《舜井编》(其中甲集为律赋)、《集贤赋》、丁明《赋编》(一百卷)等,赋格类书籍有《声律关键》、《八韵关键》、《李君瑞奇正赋格》等,此外还有如《林上舍体物赋料》、《押韵》等为律赋写作提供方便的类书、韵书等,孙奕《示儿编》中也有许多有关律赋做法的论述。

《后典丽赋》是编选、刊行于南宋孝宗时期的一部赋集,共四十卷,收集自唐末至宋代盛时著名人物的律赋,止于绍兴间,编集者为当时著名的婺学唐氏学派代表唐仲友。该书今佚,《直斋书录解题》对该书的题解云:“有王戊集《典丽赋》九十三卷,故此名《后典丽赋》。王氏集未见。”^[1]到陈振孙所处的南宋晚期,王戊^①所编的《典丽赋》已湮没无闻。王戊《典丽赋》各书录都载为“九十三卷”,但在郑樵《通志》、《宋史·艺文志》中还载有“六十四卷”本的《典丽赋》,《通志》该书目下注云:“宋朝杨翱集古今律赋”^[2],《宋史》载作者亦为“杨翱”,是知在《后典丽赋》编集之前,曾有两种不同版本的《典丽赋》存在过。杨翱、王戊生卒年均不详,但观《宋史》载两书,杨书在前而王书在后,

故六十四卷本之《典丽赋》应早于王戊赋集。明陶宗仪《说郛》只载“典丽赋”书名,不具作者与卷数,不知陶氏所见之书系何本,抑或即是唐仲友所编之《后典丽赋》。

一、《后典丽赋》的编者唐仲友其人

唐仲友,字与政,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登张孝祥榜进士,复中宏词科,陈振孙称唐仲友“以辞赋称于时”,信不虚也。正因为这种场屋名声,所以由他来编集律赋选集就有更大的市场号召力。但唐仲友并非仅以词学显于时,他受人推崇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博文洽识,尤尚经制之学”。明人苏伯衡评价唐仲友说:“干道、淳熙间,紫阳朱子、广汉张子、东莱吕子鼎立于一时,而东南学者翕然宗之。说斋唐公出乎其时,又与吕子同居于婺,而独尚经制之学,真可谓特起者矣,而岂立异哉?”^[3]所以《中国通史》将其所代表的唐氏婺学派与“张栻为代表的理学湖湘学派、吕祖谦为代表的吕氏婺学派”相提并论^[4]。

唐仲友,宋史无传^②,关于唐仲友其人的人品历来有争议,更因为唐仲友与朱熹之间的一段公案,使后人对于他的评价不免分歧。关于朱熹与唐仲友之间的纷争,《晦庵集》卷十八、十九收录的六份弹劾唐仲友的奏状代表了“贬唐”派的基本观点,然明宋濂作《唐仲友补传》称其治台州:“发粟赈饥,

[收稿日期] 2010-10-18

[基金项目] 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宋代进士考试与文学综论”;成都理工大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宋代民间助学研究”(2008YR19)

[作者简介] 许瑶丽(1975-)女,文献学博士,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

抑奸拊弱,创浮梁以济艰涉,民赖利焉。”^[5]后朱右、朱彝尊、朱鹤龄及四库馆臣皆从此说^⑤。而关于“发粟赈饥”、“创浮梁以济艰涉”两事朱子却有异论^[6],同一事件,由于立场不同,其间是非殊难分辨。宋濂乃明人,其所申说或有偏颇,但宋人对于唐仲友与朱子交构一事,已有说法。周密《齐东野语》“朱唐交奏本末”条称:

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吕伯恭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朱主吕,故抑唐,是不然也。盖唐平时恃才轻晦庵,而陈同父颇为朱所进,与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尝狎籍妓,嘱唐为脱籍,许之。偶郡集,唐语妓云:汝果欲从陈官人邪?妓谢。唐云:“汝须能忍饥受冻乃可。”妓闻大恚,自是陈至妓家,无复前之奉承矣。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问:“近见小唐云何?”答曰:“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冤狱,乞再巡按。既至台,适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陈言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驰上。时唐乡相王淮当轴,既进呈,上问王,王奏:“此秀才争闲气耳。”遂两平其事,详见周平园《王季海日记》,而朱门诸贤所著年谱、道统录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论也,其说闻之陈伯玉式卿,盖亲得之婺之诸吕云^[7]。

此种说法亦为清潘永因所采,其编《宋稗类钞》对此事的叙述更为详尽^[8]。但此说不免过于回护唐仲友。观南宋俞琰《读易举要》称:“金华唐仲友与政,少登两科,历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知信、台二州,江西提刑,孝宗深知其才,不幸而卒,年仅五十三,作《六经图谱》十卷,名曰《帝王经世之书》,嘉泰元年,庚戌平园周必大为之序。”^[9]俞琰,理宗时人,所处时代去朱、唐未远,其精于易学,学说“以朱子为宗”^{[9] (四库提要)},但他对于唐仲友的才华的评价,却沿用周必大之说,颇抱怜惜之意,并绝口不提朱唐交奏的事情,与其他宗尚朱熹者迥异。观朱熹劾唐仲友六状,其间情事首尾俱在,当非全然虚构。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亦载“晦翁按唐与正”事,其说虽亦主陈亮从中挑拨引发事件,但对唐仲友的评价则是一分为二。他一方面肯定唐仲友“博学工文,熟于度数”、知台州“政颇有声”,但另一方面也指出唐仲友私于官奴、其子颇通贿赂之事^[10],总之“唐虽有才,然任数要非端士”,此可谓中肯之见。吴子良指唐仲友与陈亮为邻时,故意出题为难陈亮,令其出丑一事,虽难确证,但观《癸辛杂识》“唐尧封”条所载,则唐仲友之行事当如此也,其云:

唐仲友之父、侍御尧封,孝庙时以礼部侍郎大

司成除侍御,有直声。尝论钱尚书礼,左迁小龙场,及去国,同朝送之,馆学为空。孝宗知之,叹曰:“遂为唐氏百年口实。”初入言路,钱迎问第一人,答以方思之,归语仲友,仲友曰:“大人失言,当云此行正为公来也。”^[11]

唐仲友之父唐尧封恬静有守、正直敢言,因劾论尚书钱端礼而左迁,“同朝送之,馆学为空”,连宋孝宗也不免感叹,此可见唐尧封在朝廷与馆学中的影响力。而唐仲友谓父亲失言,当云“此行正为公来也”一句,则清楚地显示了唐仲友不但继承了父亲的“敢言”性格,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此再观吴子良、周密所载事件缘由,则颇有几分可信了。

唐仲友的多才,颇为人称道,除南宋俞琰外,洪适赞其:“发策玉堂,奏篇甚善”^[12],南宋王象之称其“博文洽识,尤尚经制之学”,周必大称其:“于书无不观,于理无不究”。唐仲友不仅“工于辞赋”、政绩斐然,而且在史学和经学方面都很有成就,其《帝王经世图谱》一书完成于他任著作佐郎期间,该书“凡天文地理,礼乐刑政,阴阳度数,兵农王霸,本之经典,兼采传注,类聚群分,凡百二十二篇。”^[13]周必大为其作序谓:“凡天文地理,礼乐刑政,阴阳度数,兵农王霸皆本之经典,兼采传注,类聚群分,旁通毕贯,使事时相参,形声相配。或推消长之象,或列休咎之证,而于郊庙学校,畿疆井野,尤致详焉。各为总说,附其后,始终条理,如指诸掌。”^[14]评价非常高。此外,唐仲友见于著录的作品还有《六经解》百五十卷、《九经发题》^[15]、《经史难答》、《孝经解愚书》^④各一卷、《诸史精义》百卷^⑤、《帝王经世图谱》十卷、《干道秘府群书新录》八十三卷^⑥、《天文详辨》、《地理详辨》^⑦各三卷、《故事备要》、《词科杂录》各四卷、《陆宣公奏议详解》十卷、《说斋文集》四十卷。在这些著作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主要是为科场应试者编的书籍如《九经发题》、《经史难答》、《诸史精义》、《故事备要》、《词科杂录》等,这显示了唐仲友一生与教职的密切联系。唐父尧封,曾为秀州、湖州州学教授,又进为太学博士,在任命唐尧封的敕命里有云:“朕劝学励贤,恢张文教,令四方肄业之士,合经术、词赋为一科。惟时胶庠,实号首善,师儒之选,尤慎择人。以尔尧封抱艺不群,累更侯泮;……是能兼二者之长,可以课诸生之习。夫经为至治之法,赋亦古诗之流,通经者欲中道而从容,能赋者贵体物而浏亮,士之器识于此可观,往其究心,训迪毋倦可。”^[16]是知唐尧封是经术、诗赋两能之士,且累更侯泮,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的三个儿子都考中了进士。有了这样的家学渊源与教养,加上唐仲

友除历任馆职如著作佐郎、秘书省正字、实录院检讨官等外,还曾担任太学公试官,在台州任上“大修学,又修贡院”^[10] (卷三,“晦翁按唐与正”条),告老还乡后还“开席授徒,学者数百人”^[15] (卷二百四十三),可以说唐仲友一生与教育关系密切,即使在地方官任上,他也不忘刊刻教学用书,本文重点讨论的《后典丽赋》一书正刊刻于他任台州知府时。

关于宋代科举考试与印刷业的关系,林岩先生已有专文详论,他指出宋代“广大举子对科举考试用书的需求导致印刷业介入到这一有利可图的行当中来。保守地估计,至迟在北宋真宗、仁宗统治的时代^⑥,雕版印刷术已经对科举考试发生影响。”“整个宋代,民间书坊都是科举考试用书最主要的刊行者,其目的在于获取经济利益。”^[17]正如笔者前文所述,北宋的科举书籍的编撰者多为文苑名流,且留名文学史者如晏殊、宋祁等不乏其人。但到了南宋时期,书坊谋利的现象愈来愈突出,科举书籍的编撰由官方转向民间,出现了大批质量低劣的律赋集,如《指南赋笺》之类,并且随着宋代灭亡后,元代科场改试古赋,这些书坊作品又多湮没无闻,所以,我们今天很难考知某书在当时的传播情况。而唐仲友编集的《后典丽赋》因了朱熹与唐仲友的一段官司,才让我们得以了解当时律赋书籍的雕印、传播的细节。

律赋在南宋时期的地位早已风光不再,尽管律赋仍然作为进士考试的科目之一,但殿试已不再试赋,而改为试策^⑦,并且进士科评卷往往沮抑辞赋,置之下陈^⑧,所以文学名家多避之而不及,罕有亲身编集律赋者。而唐仲友作为南宋婺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不避低贱,躬身编集律赋,实为罕见。此书后来的目录书籍也多加收录,说明该书尚有一定传播价值,可以作为南宋律赋选集的代表。因此,仔细分析《后典丽赋》的选文情况、刊刻情形、传播方式当有助于我们了解南宋科场书籍的某些细节。

二、《后典丽赋》选文略古详今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载:

《后典丽赋》四十卷,金华唐仲友与政编。仲友以辞赋称于时,此集自唐末以及本朝盛时名公所作皆在焉,止于绍兴间。先有王戊集《典丽赋》九十三卷,故此名《后典丽赋》,王氏集未见^[1]。

《后典丽赋》选文上起唐末,下至南宋绍兴年间名公所作皆在焉,其收文范围较广。相较于北宋范仲淹编集《律赋衡鉴》“所举之赋多在唐人”,《后典丽赋》选文已明显侧重于本朝名公之作。范仲淹

倡导律赋学唐,具体一点说是学习中唐白居易、独孤绶的律赋,并希冀“由有唐而复两汉,由两汉而复三代”之文学。而唐仲友选文已弃中唐而追唐末律赋,唐末律赋格律趋于谨严,大体符合宋代律赋的格律标准。而中唐之赋,体式未严,难合宋人标准,所以不能入选也在情理之中。但范仲淹编集《赋林衡鉴》的天圣年间,科场律赋已严格律,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依然大量选入中唐律赋,希望以唐作振拔宋人律赋,其引领文风走向的意图是非常显豁的。而唐仲友此书,则惟科场规格是遵,迎合的意图明显,而引领风气的意向却阙如。

此外,《后典丽赋》收文止于南宋绍兴年间,这一方面由于该书编于孝宗朝,一般不选本朝人作品是编选文集的惯例,所以唐仲友选文止于绍兴年间。众所周知,北宋徽宗朝不试诗赋三十五年,科场文学水平急剧下降,至建炎、绍兴年间进士科复试诗赋,当时律赋的创作水平是不高的。秦观在说到神宗朝不考诗赋十五年后的状况时说:“今赋乃江左文章雕敝之余风,非汉赋之比也。国朝前辈多循唐格,文冗事运,独宋、范、滕、郑数公,得名于世。至于嘉佑之末,治平之间,赋格始备。废二十余年而复用,当时之风未易得也已。”^[18]何况经历了北宋末严苛的诗赋禁令之后,南宋初年律赋的创作水平可想而知。即使如此唐仲友编选时对绍兴年间的律赋仍然不废拣择,其重今作、略古作的选编标准是很明显的。

三、《后典丽赋》的刊刻与传播

唐仲友的家乡在浙江婺州,此地是南宋时期印刷业相当发达之地,尤其是在科举书籍的雕印方面,与福建建宁府、四川地区、临安府并列,受到政府特别的关注,绍熙四年六月,在臣僚的进言中提到:

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划,不可漏泄。今乃传播街市,流布四远,事属未便,乞严切禁止。诏四川制司下行下所属州军,并仰临安府、婺州、建宁府,照见年条法指挥,严行禁止……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仍要各州通判专切察觉,如或违戾,取旨责罚^[19]。

上文中提到的四川、临安府、婺州及建宁府很明显是当时印行士子程文的集中地。流传至今的唯一一本南宋律赋格书《声律关律》最早即刊刻、印行于福建建宁府^[20]。而《后典丽赋》的印行则与婺州有密切的关系。

《后典丽赋》的编定时间难以确定,但从朱熹

《按唐仲友第三状》中我们了解到该书第一版乃雕印于台州，而印制于婺州唐仲友自家的书坊。在这纸状文中，朱熹写道：

仲友自到任以来关集刊字工匠在小厅侧雕小字赋集，每集二千道，刊板既成，般运归本家书坊货卖。其第一次所刊赋板印卖将漫，今又关集工匠，又刊一番，凡材料、口食、纸墨之类，并是支破官钱^[6]（卷十八）。

在朱熹的这段上书中，我们可以获知，第一，《后典丽赋》刊刻于唐仲友任台州州守期间，并且不止雕一版，还曾再版，可见该书在当时畅销的程度。第二，《后典丽赋》的开本属于南宋科举书籍典型的“夹袋书”。所谓“蝇头细字，缀成小册”，朱熹提到的“小字赋集”即谓此类迎合士子考试作弊的小版赋集。第三，唐仲友在家乡婺州开了书坊，而《后典丽赋》的刊刻地却在台州，是因为唐仲友为了便于用官钱来支付刻版的费用，所谓“凡材料、口食、纸墨之类，并是支破官钱”，此即暴露了他贪枉的一面。事实上，唐仲友支用官钱刊刻的书籍还远不止《后典丽赋》一本，其受到朱熹揭发的还有在台州开雕的《荀子》、《杨子》、《文中子》、《韩愈集》。这四本书还曾送与朱熹一套，但朱熹没有接受，而是还给了台州军资库^[6]（卷十九）。但对于这些四子书籍的去向，朱熹却很关注，他说：“据叶志（库子）等供，草簿内仲友以官钱开荀、杨、文中子（王通）、韩文四书，即不见得尽馈送，是何官员。”支用官钱刊刻的书籍主要用于馈送，但这套书籍的真实去向却是：“唐仲友开雕荀、杨、韩、王四子印板，共印见成装了六百六部，节次径纳书院，每部一十五册，除数内二百五部，自今年二月以后，节次送与见任寄居官员，及七部见在书院，三部安顿书表司房，并一十三部系本州史教授范知录、石司户、朱司法经州纳纸兑换去外，其余三百七十五部，内三十部系表印，及三百四十五部系黄坛纸印到，唐仲友逐旋尽行发归婺州住宅内，一百部于二月十三日令学院子董显等与印匠陈先等打角用箬笼（用箬叶与竹篾编成的盛器）作七担盛贮，差军员任俊等管押归宅，及于六月初九日令表背匠余绶打角一百部，亦作七担，用箬笼盛贮，差承局阮崇押归本宅，及一百七十五部于七月十四日又令印匠陈先等打角，同别项书籍亦用箬笼盛贮，共作二十担，担夯系差兵级余彦等管押归宅分明。”^[6]（卷十九）朱熹详尽地罗列了六百零六部四子书的具体去向，其中半数以上被唐仲友发送回自家书坊售卖牟利，与《后典丽赋》的情形类似。所以史载南宋官僚贪墨成风，如唐仲友这样的名士尚且不免，其余可知矣。

此外，据朱熹的《按唐仲友第六状》陈述，唐仲友不但支用官钱雕印程文、子书，而且还参与了一起制造“假会子”的案子，他收留了一名因仿造假会子而服刑的工匠蒋辉，并利用蒋辉雕造“会子版”^⑩。有趣的是，在蒋辉雕造会子版的间隙，唐仲友的下属，亦是唐仲友的侄子三六宣教曾命蒋辉雕造《后典丽赋》，其文称：

又至两日，见金婆婆同三六宣教入来，将梨木板一十片双面，并《后典丽赋》样第一卷二十纸，其三六宣教称：恐你闲了手，且雕赋板，俟造纸来^[6]（卷十九）。

据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状》称：“其第一次所刊赋板印卖将漫，今又关集工匠，又刊一番”推测，此次命蒋辉所雕《后典丽赋》第一卷乃是该书的第二次雕印，蒋辉完成了第一卷的雕版工作，而朱熹到台州后了解到的情况则表明第二版的《后典丽赋》雕版工作是多人完成，至淳熙九年八月尚未完成。奏状称《后典丽赋》第一卷二十纸，亦即一卷二十页，如果按宋版书的常规，每页九行，行一十七字来计算，大概每页可容字150字，标准的科场律赋要求360字以上成篇，便大多数完篇均在四百字以上，每篇应大约三页，而每卷二十纸大概可收赋七篇。《后典丽赋》共四十卷，全书约收律赋作品280到300篇，这个数量与宋代的其他律赋集比起来似乎偏少。众所周知，此类书籍是为举子参考之用，甚至剽窃之便，所以赋例应尽可能的丰富才有市场吸引力，所以笔者估计，《后典丽赋》的字应该是小字，所以朱熹又称之为“小字赋集”，此与《后典丽赋》应为同一本书也。《中国印刷通史》认为，宋代“有的书，把整个版面分成上、下两栏，或三栏。每栏内再刻印文字。这种版面分栏的书籍，一般在大众日用书、举子场屋书或通俗文学小说之类的书中，特别常见。”^[11]所以作为一本应时的律赋集，为了争取更大的市场空间，相信《后典丽赋》不会在版面上与时立异。此外，奏状载：“辉开赋板，至十月至十二月中旬”，也就是说蒋辉雕印《后典丽赋》第一卷共耗时两月余，按每天刻两百字计算^⑪，二十纸的常规容量仅三四千字，蒋辉作为熟练的刻工，应该十五天左右即可完成，但其实际耗时却远远超过常规用时，这说明《后典丽赋》的版式应是容量颇大的分栏、小字格式，因而《后典丽赋》的实际收入文章的数量应该近千篇。

宋代的江浙地区，辞赋本来就很兴盛，民间习赋的传统很浓厚^⑫。而唐仲友作为婺州的名门，家学颇有渊源，加上父亲曾任太学博士，一门三进士的佳绩，所以由唐仲友编撰的《后典丽赋》在其家乡

应该是颇具影响力的,朱熹所言再版之事,即是该书畅销的有力证明。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后典丽赋》虽编自名门,系南宋同类书籍中的上品,但其商业意味已经十分明显,它不仅以牟利为目的,而且其雕印、售卖行为本身就是编者唐仲友贪墨的证据。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书籍的编选略古重今,迎合科场新风也就蔚然成风。而除此以外的南宋律赋选集,多由书坊主持编选,其格愈卑,在这样的范文引导之下,南宋律赋步步趋向俗滥,教赋者亦以细枝末节之技传诸后生,律赋被条分割析,以至于支离破碎也就难以避免了。

注释

①《宋史》卷二百九,艺文志第一百六十二,艺文八载:“王咸《典丽赋》九十三卷。”将“王戊”误写作“王咸”,当以“王戊”为是。

②关于宋史无唐仲友之传的原因,《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五称:宋唐仲友撰,仲友,字与政,金华人。绍兴中登进士第,复中宏词科,后守台州,与朱子相忤,为朱子所论罢,故宋史不为立传。

③参见《明文衡》卷四十六:朱右《题唐仲友补传》,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四十三,《帝经世图谱》四库提要,《龙川文集》四库提要,《龙川词》四库提要。

④《文渊阁书目》卷二载:“唐仲友《愚书》一部一册”,此或即为《孝经解愚书》

⑤《玉海》卷四十九载:“唐仲友《两汉精义》、《唐书精义》”,此两书当为《诸史精义》的一部分内容。

⑥该书系唐仲友任秘书省正字期间,与秘书丞尤袤一起完成的,具体内容参见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九《乞取唐仲友、尤袤书目札子》

⑦《千顷堂书目》卷八载:“唐仲友《地理详辨》二卷”,而明人苏伯衡指为“三卷”。

⑧徐铉《骑省集》卷二十三《韵谱后序》云:“初《韵谱》既成,广求余本,孜孜雠校,颇有刊正。今复承诏校正《说文》,更与诸儒精加研核,又得李舟所著《切韵》,殊有补益。……颍川陈君文灏,任当守土,宠列侍祠。……因取此书,刊于尺牋,使模印流行,比之缮写,省功百倍矣。噫仁人之用心也,因躬自篆籀,庶祇来命。序之于后,以记其由,雍熙四年正月序。”据此条文字可知,印刷业直接造患于科举至少在北宋太宗雍熙年间及以前。

⑨《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载绍兴四年所定《贡举条式》:“殿试,欲习诗赋、习经义人并同试策”。

⑩《宋史·选举志》第一五六卷,又参见《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四。嘉泰元年起居舍人章良能陈主司三弊,第一即为“沮抑词赋太甚,既暗削

分数,又多置下陈”

⑪关于此事,杨联升《会子形状考》有具体的论述,参见《国史探微》。

⑫蔺文锐《商业媒介与明代小说文本的大众化传播》(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ID=12347):“洪武七年(1374)刊刻《宋学士文集》,12万余字,十个工匠五十二天才完成,平均每个工匠每天可刻两百余字。”此虽是明代的情况,但依此推宋代应该相差不远。

⑬宋真宗时冯拯指出:“比来省试但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江浙士人专业诗赋,以取科第。”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

参考文献

- [1]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卷十五.
- [2] 郑樵. 通志[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卷七十.
- [3] 苏伯衡. 说斋先生文粹序[M]//黄宗羲. 明文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卷二百三十四.
- [4] 《中国通史》第七卷第十章南宋中后期的政局 第一节“孝宗中兴”[EB/OL]. [2008-10-12]. www.dushu.com/showbook/101155/1038538.html.
- [5] 朱右. 题唐仲友补传[M]//程敏政. 明文衡(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卷四十六.
- [6] 朱熹. 晦庵集[M]. 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卷十八.
- [7] 周密. 齐东野语[M]. 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卷十七.
- [8] 潘永因. 宋稗类钞[M]. 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卷十七.
- [9] 俞琰. 读易举要[M]. 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卷四.
- [10] 吴子良. 荆溪林下偶谈[M]. 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1] 周密. 癸辛杂识[M]. 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别集卷上.
- [12] 洪适. 盘洲文集[M]. 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卷二十二.
- [13]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卷二百二十八.
- [14] 周必大. 帝王经世图谱原序[M]. 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卷首.
- [15] 朱彝尊. 经义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卷二百四十三.
- [16] 周麟之. 海陵集[M]. 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卷十五.

[17] 林岩. 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284-285.

[18] 李荐. 师友谈记[M]. 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9] 徐松. 宋会要辑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刑法二之一二五.

[20] 郑起潜. 声律关键[M]. 续修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第1717册.

[21] 张树栋, 庞多益, 郑如斯等. 中国印刷通史[M].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1999.

On Compiling and Spreading of HOU Dian Li Fu

XU Yao-li

(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Chengdu 610059 China)

Abstract The syste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more steady than that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us the compiling of Lvfu collections were prosperous. However, the books were mostly lost today. HOU Dian Li Fu is the representative Lvfu florilegium, compiled by TANG Zhong-you of Wu School. the text of HOU Dian Li Fu thinks much of contemporaries' works and make light of ancients' works. Moreover, the publishing of HOU Dian Li Fu involved some corruption, which shows the obvious motivation of seeking profit. The quality of works in HOU Dian Li Fu are clearly lower than the Lvfu florilegium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us, the reasons why Lvfu came down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partly should blame the Lvfu florilegium such as HOU Dian Li Fu.

Key words HOU Dian Li Fu ; TANG Zhong-you; Lvfu; rule of compiling; publishing

编辑 刘 波

(上接第15页)

Source and Flowing of Theory Development on Firm'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XIAO Yan-gao WENG Zh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To obtain and maintai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On this issue,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 has evolved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position, resource-based view, the theory of core competence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knowledge-based view. In the competitiv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increasing uncertainty, knowledge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core strategic resource for firms to maintain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pursu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ts mechanism of firm'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re becoming hot issues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Key word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dustry position; core competence; dynamic capability; knowledge; Review

编辑 何 婧